

谢觉哉的家风

□ 姜玉峰

谢觉哉是著名的“延安五老”之一，被人们尊称为谢老。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虽身居高位，但谢老从不以元老自居，而是严格要求配偶子女及亲属，带头树立良好家风。

和谐融洽一家人

由于时代原因，谢老一生有两段婚姻。第一段婚姻是典型的旧中国农村传统婚姻，当时他只有15岁，妻子长他5岁，名叫何敦秀。第二段婚姻是革命婚姻，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谢觉哉被派到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做党代表，由于工作需要，在组织的安排下与王定国结为夫妻。与王定国结婚后，谢觉哉依旧关心湖南老家的情况，关心何敦秀的生活以及孩子们的教育问题。20世纪50年代末，80岁高龄的何敦秀被她的儿子谢放接到北京居住后，谢觉哉和王定国还请她到家中做客，也多次过去看望她，并经常送去生活费。

谢觉哉对子女要求非常严格，但也非常慈爱。他通过家书与子女展开心灵对话，事无巨细地关心教导成长中的儿女们，公开出版的家书就有100余封。他叮嘱孩子们“不但要经受艰难环境的考验，而且要到生死关头去经受考验”。他鼓励儿子谢放参加王震率领的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开辟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并在儿子的手册上题下“不惧、会想、能群、守纪、勤学、强身”这12个字。他从不束缚孩子的发展，支持孩子实现自己的理想。谢觉哉晚年身体每况愈下，子女又分散在各地，家中只剩正准备参军的小儿子谢亚旭。王定国建议把小儿子留在身边，谢觉哉却回绝了，“父母要支持孩子实现革命理想”。他又对谢亚旭说：“小时候你整天拿着木头枪东冲西杀，说长大了要当解放军……现在正是当兵的时候，不要挂念家里，也不要挂念我的身体。”小儿子来到部队后，被分配到南京郊外，谢老病重也不让家人叫他回来，直到谢老病逝，儿子才知道已同父亲永别。

教诗开课学习忙

谢觉哉自小勤奋好学、酷爱读书。他4岁从师，11岁就读完了《诗经》《春秋》《易经》《礼记》等经

典，21岁考中秀才。之后在毛泽东、何叔衡、蔡和森等人的影响下，系统学习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关于维新变法的著作，完成了由“反封建的秀才”向“革命的新文化战士”的转变，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谢觉哉一直注重培育勤奋好学的家风，这在他与王定国结婚时就初露端倪。两人结婚时王定国还是文盲，有一次谢觉哉写文章时让她去办公室拿《西北日报》，拿了3次都不对，谢觉哉纳闷地问怎么回事，王定国不好意思地回答她不识字。谢觉哉听后立即说：“不用怕，我教你！”从那以后，在他们相伴的34年中，谢觉哉教王定国学诗词、练书法，在谢老的教导下，王定国转变成为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谢觉哉非常重视子女的学习，潜心培养他们勤奋好学、刻苦钻研的良好习惯。20世纪50年代，鉴于子女多数都在住校的实际情况，谢觉哉夫妇就利用周末时间开办家庭课堂，给孩子们集体上课。王定国讲述自己童养媳的经历忆苦思甜，谢老则从吃、穿、住等各个方面谈古说今教育子女。有一次，谢亚旭因为作业难，没有完成就睡觉了。谢老晚上开会回来听说此事，立即走到床边将小儿子轻轻唤醒，不顾一整天工作的疲惫，陪着孩子直到把难题解出写好才休息。“要学点东西，没有刻苦的精神不行，作业难做，下决心钻进去就不难了。”事后，谢老语重心长地开导儿子。

谢觉哉还非常关心身边同志的学习，尤其是要求他们学习毛泽东的著作、文章。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期间，他曾以自己写的通知被毛泽东一字不留全改了，又在毛泽东的教导下悟出要“向人家学、向自己学”的经验，告诫高院的工作人员要勤于学习，除学习毛泽东已经发表的著作、文章外，还要选印他最近的一些短篇或批语二三十篇，作为范文熟读深思。

廉洁奉公一身清

作为党的高级干部，谢老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从没有什么特殊要求，对子女和亲属更是严格约束。他经常告诫儿女们：“我是共产党人，你们是共产党人的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

不许子女特殊化，是谢觉哉家风的特色之一。早在延安时期，有一次

他的孩子到机关食堂玩耍，正遇到开饭时间，管理员想留孩子吃“小灶”，谢觉哉坚决反对，马上要求孩子回家，并嘱咐他们以后少去“小灶”食堂。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期间，因工作需要，公家配给谢老一辆小车。有一次，偶然发现子女用了车后，谢觉哉非常生气，“国家给我的汽车是工作时才使用的，你们没有权利叫司机开我的车外出”。随后，谢觉哉叫家人付了车费，还在一次党组织生活会上，就孩子动用汽车的事作了自我批评。谢觉哉参加革命前在湖南老家育有4男3女。新中国成立后，湖南老家的儿女们纷纷希望在京“做大官”的父亲给予“照顾”，走出农村到北京工作。谢老写信劝他们不要来，他说：“你们会说我这个官是‘焦官’（湖南方言，指不挣钱的官）。是的，‘官’而不‘焦’，天下大乱；‘官’而‘焦’了，转乱为安。”

他还作诗一首：“你们说我做大官，我官好比周老官；起得早来睡得晚，能多做事即心安。”将自己比作家乡村子里一辈子在地主家做长工的周老官，这显示出谢老的人民公仆本色。后来，有的儿子不听劝阻来京要求安排工作，谢觉哉依旧铁面无私，他说：“全国刚刚解放，下头更需要人，你有文化，还是回家乡工作好。”面对妹夫提出介绍工作的要求，他则回答道：“你要我安排你的工作，除非我回去当老百姓，你来当部长。”

1949年后，谢觉哉曾3次回到湖南，有两次到南甯冲老家。在老家，谢老对子女和家乡干部们的浮夸接待、农村山林环境的破坏、老百姓生活困顿的情况很有意见，他批评教育道：“修车路，不是对我的尊敬，而是对我的不尊敬，人民看了，要说我谢胡子是个官，是个架子很大的官，这是浮夸风的反映。”并坦言：“我两次回乡，都不很称意。我还想回乡一次，不过有三个条件：第一不要派人包围我，要让我行动自由；第二农村要容易买到猪肉；第三要看到到处是幼林。”言语中体现出老一辈革命家清廉正派的风骨。

勤劳节俭乐吃苦

谢觉哉的勤俭家风源自其从小受到母亲的熏陶。谢觉哉的母亲是一位善良的妇人，会劳动、善家务、俭省节约，很受人尊敬。据谢老回忆，母

亲从不溺爱他，从小就教他喂猪割草，教他做人处世的道理，勤劳俭朴、做个好人等朴素道理他很早就铭记于心。

谢觉哉非常注重孩子勤劳品格的培养。早在参加革命前他就曾告诫还在上高小的长女琼英，“读书和劳动是两不误的事情，学会烧茶、煮饭等治家之事同等重要”。

抗战胜利前夕，当从老家的来信中得知女儿冰茹已能自食其力时，他兴奋地回信：“冰儿自己劳动养家很好，我听了非常高兴。靠遗产生活，是最没出息的人干的。”新中国成立后，谢觉哉教导子女“凡自己能做的事，都要自己动手，扫地、洗衣服、煮饭、炒菜、院子里挖土种菜，都要做，做惯了就闲不住，身体也会强壮”。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三年困难时期，院子里有块空地，谢老就在休息时间带着家人翻地种菜，自力更生。

谢觉哉生活非常节俭，常常是一件衣服、一双鞋子一穿就是十几年，每当家人要给他买新衣、做好吃的时，他总是说：“我们的吃穿已经很好了，再好就要过分。”谢老不仅自己生活节俭，还经常教导子女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20世纪60年代，谢老家中人多，孩子们吵吵嚷嚷地喊着要换房子。为此，谢老给子女们写了一封家信。信中写道：“有一个观点必须更正：这个房子是很好，不要因有点点毛病，就叫嚷起来。”他以“有的人一家子住在一间房里，农村的老百姓有的一年吃不到油，北京市的居民也只能分到4两油，鸡蛋、肉也很难买到”等例子告诫子女“要看过过去，看别人，要工作在先，享受在后，当广大人民还十分困难的时候，我们过着这样的生活，应该感到不安，而绝不应该感到不足”。

谢觉哉一生扬鞭奋蹄、笔耕不辍，留下了百余万字的家书、日记，千余首诗歌和数十万字的《谢觉哉文集》。董必武称赞他“传家绝业诗千首，报国方多笔一枝”。林伯渠赞其“清词如海复如潮，健笔春秋百万刀”。谢觉哉和谐融洽、勤奋好学、廉洁奉公、勤劳节俭的家风在这字里行间、言传身教中流转，具有很强的现实教育意义。

（摘自2019年第3期《党建》，原标题为《共产党人的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延安五老”之一谢觉哉树立良好家风的故事）

作为中共中央的军事领导人，周恩来高度重视情报工作。

周恩来在1928年春建立的第一个反间谍关系杨登瀛（鲍君甫），是陈立夫的亲信、国民党中央的驻沪特派员。他提供的大量情报，对防止党的机关被破坏、营救战友和清除内奸起了重要的作用。

为了更迅速地传递信息和情报，周恩来在1928年5月开始着手组建无线电通讯工作，他派毛齐华到苏联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并从军委抽调李强和张沈川在沪西极司菲尔路福康里九号租了一幢三层楼房研究无线电技术，1929年10月试制成第一套收发报机，培训出第一批报务员，在上海建立了党的第一个秘密无线电台。

1930年1月，建立了上海与香港党组织之间的电讯联络。1931年9月，上海中共中央与中央革命根据地之间正式开通了无线电通讯。周恩来还要求李强、张沈川等人组织培训班，为党和红军培养了一批无线电通讯技术骨干，并先后将这些骨干派到各地红军中去，如涂作潮、伍云甫、曾三等人被派往中央苏区；王子纲、蔡威、宋侃夫等被派到鄂豫皖苏区；喻杰生等被派到湘鄂西苏区。他们和红军的电讯人员一起，建立了红军中的无线电通讯工作，并逐步建立起中央与各地红军以及各地红军相互间的无线电通信网。

为了保证无线电通信的安全，周恩来十分重视机要工作。机要工作的核心是密码，周恩来亲自编制了中共 and 红军的第一本密码——“豪密”，这是以他的化名“伍豪”命名。周恩来堪称中共和红军中最早的反间谍专家、密码专家。

（摘自2017年第9期《党史博采》，原标题为《周恩来与军史之最》）

党内和红军中最早的反间谍专家、密码专家

□ 郑林华



周文雍的“自首书”

□ 陈永红

周文雍，1905年生于广东开平。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1月27日，正在广州做地下工作的周文雍被捕。敌人用酷刑、高官、金钱、“自由”，都无法达到他们的目的，就强迫周文雍写自首书。他满腔怒火地接过硬笔，淋漓尽致地揭露反动派的滔天罪行，并在监牢的墙壁上慷慨激昂地写下：

“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

周文雍以这首用鲜血和生命写成的诗，表达了对对党对人民对革命的无限忠诚，表现出他在手执屠刀的敌人面前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

（摘自2010年第12期《红广角》，原标题为《革命者爱情的绝唱——周文雍和陈铁军刑场上的婚礼》）



何雪松与家人的合影

在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收藏的珍贵文物中，有这样一张泛黄的老照片。照片上，一家三口精神饱满，左侧是年轻英俊的父亲，右侧是靓丽可人的母亲，二人呵护着天真无邪的孩子。不难想象，这是多么幸福的一家人。

翻转照片，背后是题词：坚持我们昔日的意志，为正义真理而斗争！这是一九四四年春天在桂林时的小影。中立者是你不曾见到的女儿丹尼。齐修存念。凌、英、丹尼赠一九四五·六·三

据红岩联线工作人员介绍，这张照片是红岩烈士何雪松的妻子莫凌志赠与友人欧阳齐修（著名作家、编剧阳翰笙之弟）当作留存纪念的，照片中正是何雪松一家人。

读完饱含信念的题词，再次翻转照片，何雪松那英俊的面庞仿佛多了几分坚毅和勇猛，在历史见证下，他已然成为一名受人敬重的革命斗士。

被捕——为了挽救危局。何雪松，1918年出身于书香门第，早年曾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

一张老照片背后的红岩故事

□ 贺兴梅

下属的电影放映队工作。在放映队期间，何雪松积极宣传抗日思想，而后担任中学教师，利用讲坛积极宣传新文艺思想，后来因为支持学生运动被校方解聘。

1946年，历经坎坷的何雪松带着一家人来到重庆，住在七星岗纯阳洞抗建堂对面的楼房里，随后在海棠溪孙家坡第五军官总队任上校教官兼《五总》月刊总编辑。

1947年10月9日傍晚，外出数日的何雪松突然回来，他脚步急促，进院子时边走边脱外衣走进屋里并将房门关上。

不一会儿，几个拿着手枪的人冲进院子，妻子莫凌志被吓了一跳。“你们干什么？”莫凌志冲这群人问道，他们没有理会，冲到房门前，一脚把门踹开。

一群人冲进屋，只见何雪松坐在火盆边，拿着火钳拨弄着燃烧的纸屑。领头的特务一把夺过火钳，发现纸已化为灰烬。他气急败坏地大吼：“你是何雪松吗？”

“是的。”何雪松冷静地回答。“走，跟我到二处去谈话。”何雪松一听，站起身来，穿上外衣，走到摇篮前，亲了亲只有三个月大的小儿子，便从容走出家门，妻子带着儿女哭哭啼啼地追在后面。

何雪松回头对妻子大喊：“一定要

把孩子抚养大。”话音还未落，几个特务就七手八脚地把他往车上推，车子“呼”地一下开走了。

原来，从军官总队退役后，何雪松与萧中鼎、李子伯计划发动武装起义，以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四川。然而，起义消息被泄露，何雪松负责的联络站因叛徒告密遭到破坏，组织要求他立即转移。

“家中还有一份机密文件，若是落入特务手中，后果将不堪设想。”思来想去，何雪松决定冒着生命危险回家销毁文件。哪知，这一次回家，竟成了何雪松与妻儿的永别。

写诗——为了擎举希望。被捕后的何雪松等人被押往重庆白公馆监狱，何雪松严词拒绝“自首便可获释”的条件。次年4月，他被转囚于渣滓洞监狱。在被称为“人间魔窟”的渣滓洞监狱，关押的“政治犯”每天都面临着残酷用刑和严厉管制，但他们没有停止斗争，而是以笔为武器，写诗作文，互相鼓励。

写诗的纸，是大家节约下来的如厕手纸，笔则是从厕所篾竹墙壁上取下的蔑片磨尖做成的。“墨水”也是自制的。狱友们从破棉袄里扯出一团棉花，在油灯上点燃后丢进破碗，棉花烧完后的黑灰加水就成了“墨水”。

1949年1月29日，正月初一。当天，特务所长李磊、管理组长徐贵林

进城去了。“能不能让我们搞一场春节联欢会？”狱中难友向当时狱中策反对象、值班特务黄茂才提出，春节这天不关牢门，让难友们尽情联欢。经过斗争和谈判，黄茂才同意了。

牢门打开了，女牢的难友们把红红绿绿的被面拆下来围在身上扭起了秧歌，还唱起了《闹新春》《慰问解放军》等歌曲。男牢的难友们围了一圈，表演“风阳花鼓”“叠罗汉”“打莲花闹”等节目。

当难友们自编自演的节目一个接一个、高潮迭起之时，一群诗友悄悄“溜”进楼下一号牢房，宣告“铁窗诗社”诞生。

“我们坐在牢里，首要的就是要有斗志。常言道：诗言志，今天我先来抛砖引玉。”曾任《挺进报》编辑的古承铎将长发往后一甩，一派诗人气质地吟诵了一首《宣誓》。

“好，写得好。古兄的《宣誓》代表了我们所有人的宣誓。现在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蒋家王朝的统治不会太长了。虽然我们不能再直接参加人民解放战争，但在这个特殊的战场上，我们要以最大的努力去投入战斗，毫无愧色地去迎接革命的胜利，所以我写了一首《迎接胜利》给大家听听……”何雪松说完朗诵起来：“乌云遮不住太阳，冰雪锁不住春天，铁牢——关住了战士的身子，关不住要解

放的心愿。不怕你豺狼遍野，荆棘满山，怎比得，真理的火流，革命的烈焰。看破晓的红光，销铄了云层，解放的歌声，响亮在人间。用什么来迎接我们的胜利？用我们不屈的意志，坚定的信念！”

“好——！”诗会越开越激昂，何敬平吟诵了《把牢底坐穿》，蔡梦蔚朗诵了尚未完成的“黑牢诗篇”……“铁窗诗社”在一位位诗友激情澎湃的吟诵中正式成立。

舍身——为了迎接胜利。1949年11月27日深夜，歌乐山上寒风呼啸，雾气笼罩在四周，渣滓洞监狱阴冷彻骨。此时，大多数狱友没有丝毫睡意，有的狱友站在牢门口密切观察着外面的一切动向。

当天渣滓洞的情况有些异常——敌人在各处增派岗哨，内院和外院更换了灯泡，整个监狱被照射得如同白昼；特务办公室的电话不时响起，焚烧档案、文件的火光闪烁闪烁；外院聚集了很多荷枪实弹的国民党特务；近段时间特务以“转移”为由，分批带走了几十位狱友……尽管外面的氛围有些恐怖，但何雪松镇定自若，静静地躺在冰凉的地铺上。

一声口哨声划破了夜空的寂静。“楼上的全部下来，我们要办移交了，快！”徐贵林站在放风坝上吼叫着。沉浸在思绪中的何雪松被这突如

其来的声音惊醒，他站起来跑到牢门前，想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

“交给谁？”“交给重庆警备司令部杨森，下去安静点，等警备司令部来接人。”

何雪松意识到该来的终于还是来了：“我看这次是凶多吉少，最后的时间到了！”

很快，特务们跑上楼来，打开楼上八室，何雪松怒目横瞪：“如果我们牺牲了，你们这些强盗也活不了多久！”不一会儿，所有狱友都被转移到楼下八间牢房，牢门被铁索死死锁住。

这时，一群荷枪实弹的特务涌入内院，冲上走廊，站在每间牢房的门口。一声口哨声之后，无数子弹从每个门口射向牢里手无寸铁的人。刹那间，整个监狱枪声大作、弹片横飞、烟尘弥漫。被机枪扫中的何雪松受伤倒在了牢门口。看着身边的难友一个个倒在血泊中，看着敌人嚣张的枪口还在狂喷着火舌，何雪松用双手死死握住木栅栏门两侧、用身体挡住子弹，同室的萧中鼎等人得以生还。

面对生与死，何雪松等人毅然选择了把死亡留给自己，将生的希望留给别人。他们没有等到11月30日的重庆解放，却用身躯让活下来的人迎来了胜利的曙光。他们是革命的斗士，他们是永远的英雄。

（摘自2019年7月1日《当代党员》，原标题为《“乌云遮不住太阳，冰雪锁不住春天”——一张老照片背后的红岩故事》）

